

直面问题、探寻方法

——第2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吴晓群 阿 慧

2019年10月18—20日,第2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本届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史学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协办,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承办。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10余家出版社的学术编辑代表共100余人参会。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为“当代史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与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分别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史学理论核心观念”、“西方史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史学比较的可能性及其实践”、“见与不见——女性主义史学之眼”、“全球史及现代史学研究的兴盛与困境”等论题出发,展开热烈的研讨。本届研讨会还设立了青年论坛。

本届研讨会是《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牵头举办的第2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史学理论研究》杂志由世界历史研究所整体迁移至新成立的历史理论研究所后首次举办的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也是最近几届研讨会中规模最大、与会学者最多的一届研讨会,反映了史学理论研究的回暖趋势。

为了开好本届研讨会,避免学术研讨时议题过于分散、不易引起争论的问题,承办方提前一年着手准备,围绕大会主题设定好每一分组的议题,确定并邀请每一分组的召集人,做到提前征稿,从而保证每一分组的讨论都能做到深入、热烈。这成为这一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一大亮点。本届研讨会的另外两个特色是“女性史学理论研究者的积极参与”与“以中青年史学理论学者为主”。本届研讨会承办方的领导者,会议的承办、组织、筹备等工作均主要由女性担纲。本届研讨会的参会学者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分组讨论的主持人、讨论引言人也多由他们担任,还特设两场青年论坛。因此,本届研讨会不仅表现出史学理论研究良好的代际传承,而且也为中青年学者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机会。

一、当代史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当代史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是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也是学者们展开讨论的切入点与立足点。特别是在大会的主题发言中,学者们围绕会议主题,从各个方面畅所欲言、深入交流,集中体现了本届研讨会所提出的新时代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发展方向。

于沛(世界历史研究所)通过对“社会经济形态”学说这一老问题的新思考,反驳了“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只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或政治问题的论断,认为应该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实事求是地探讨其理论内容。这一观点是对长期纠缠的复杂问题的还原,呈现出了该问题原本具有的意义,并将之

作为新时代的核心概念加以提出。吴英(历史理论研究所)则以“唯物史观研究70年”为题,不仅梳理了唯物史观70年的发展历程,更从中国唯物史观发展现状和面临的困局出发,重新审视过往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认为理论的生机在于要以理服人,提出应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理论之树能够长青的关键所在。总之,二位的发言对当代史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提出了方向性与指导性的意见。

张广智(复旦大学)以“漫谈七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为题的发言以其亲身经历的三个小故事来贯穿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认为史学史的发展体现了史学发展未有之大变革,并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证。其一,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剪破了传统史学的脐带,中西接壤;其二,马克思史学的兴衰沉浮,潮起潮落,必将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导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其三,中外史学交流焕发出新的态势。他由此判断,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呈现出三种发展趋势:第一,由自在的初级发展阶段,发展到自为的发展阶段;第二,在20世纪两次引入西方史学成果的推动下,总体研究水平不断深入;第三,西方史学史编撰方面取得不断突破。张广智的发言既高屋建瓴,又叙事生动,紧扣西方史学史叙事路径的回归,以举重若轻的方式展现了老一辈史家对中国西方史学史发展的敏锐洞察。

张耕华(华东师范大学)以“论历史叙事的关联性”为题,围绕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这一个案,复核了历史陈述的客观性与历史事实的关联性问题。强调并引导与会学者思考史学理论如何与史学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李宏图(复旦大学)则以“直面时代现实,拓展思考空间:关于史学理论研究的一点思考”为题,宏观地思考了全球化发展中所呈现的新的时代性与空间性,及其对史学理论的冲击。他强调史学不能无视时代,史学应当回应时代的诉求。

第二场主题发言中,既有理论的考量也有个案的分析,既有老题新作也有跨学科的反思,具体表现在:姜芑(世界历史研究所)以“方兴未艾的犹太史研究”为题,指出犹太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目前中国对犹太史的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对犹太文明和以色列的认识也将有助于中国吸收其成功经验,并提升中以关系。王旭东(世界历史研究所)则以“信息史学是什么?不是什么?”为题,通过厘清相近或易混淆的概念和领域进一步阐释了信息史学的内涵。他认为历史学面对时代的需求,亦需要发展自身,作为跨学科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实践尝试的信息史学正是对这种需求的积极回应。可以说,两位学者在关注到新兴的史学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关注到了相关研究的现实意义。

徐善伟、江涓、董立河三位学者分别从史学史、史学个案及史学理论等视角,对当代史学研究中的问题与方法进行了探讨。徐善伟(上海师范大学)以“中西史学专业化道路之比较”为题,认为中西方的历史学在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强调史学的“求真”这一特性而逐步实现的。近代西方史学是在实证科学的影响下以兰克学派为代表完成史学的独立和科学化过程的,中国史学的独立则受到西学的影响,以新史学派为代表。江涓(首都师范大学)以“金元之际北方汉族士大夫与蜀汉正统论”为题,探究了金元之际北方汉族士大夫所持有的“蜀汉正统论”,不同于南宋遗民的带有强化忠义观的“蜀汉正统论”,处于“异族”政权统治之下的北方汉族士大夫以自身处境为出发点,对之产生了独特的阐释。他们将抽象的“王道”作为正统的唯一标准,以“中州士”的身份继续辅佐北方王朝的统治者追寻王道。这种阐释为不仅为其安身立命提供了支持,也为多元一体的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董立河(北京师范大学)以“史学理论及其对于‘史学实践的意义’”为题,从理论的概念内涵

着手,逐一解释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所涵盖的内容、形态与维度。他认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有相通性,亦有差异性,后者常以前者为前提。而就史学与理论的关系而言,“史学实践”不仅是一种经验描述,也需要理论支持,因此他认为两者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协作共生的相互促进关系。

刘永华、吴晓群两位学者的发言从中西史学研究的两个方面,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相结合的讨论进行了回应。刘永华(复旦大学)以“破茧而出?——当代中国史学实践的理论化挑战”为题,认为当代中国史学实践的理论化挑战,不仅在于近十几年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引入,更在于建设中国自身的史学理论。后者需要关注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内、外环境),尤其需要注意史料的基本属性和经验事实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这两者将影响学者对历史的阐释,因此,中国史学研究实践的理论化工作,应该基于对上述情况的考察之上。吴晓群(复旦大学)以“西方历史书写中的文明内涵及其意义变迁”为题提出一项长远的学术研究设想,她呼吁国内世界史学科同仁共同进行一项集体性的反思工作,希望通过系统梳理西方史学中两千多年来对于“文明”这一概念的历史书写方式,试图以一种东方的视角来全面反思西方史学界关于“文明”的定义、话语、内涵以及范式形成、意义变迁,旨在揭示西方历史书写中对于其自身文明特征的理解和追求,以呈现文明和文明史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维度上的意义。应该说,这是一个以一个主题概念为引导进行的既有时间的贯穿性又具横向关联性的研究设想,希望在这项研究中,既看到思想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又关注到不同思想的个体性和独特性,并能够在两者之间形成对话。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作为中国史学研究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唯物史观无疑是当代史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本届研讨会上,学者们的发言不仅涉及中国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等传统的论题,还关注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中东史学与西方史学的研究。

在本届研讨会上,对于郭沫若的学术思想的考察是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李勇(淮北师范大学)在综合考察郭沫若与胡适之间的学术争论后认为,郭沫若信奉共产主义,秉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胡适则鼓吹自由主义,坚守实验主义方法,并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些就决定郭沫若与胡适之间产生争论的必然性。特别是在先秦诸子问题上,胡适要扬墨抑孔,郭沫若则势必抑墨扬孔。何刚(乐山师范学院)则关注到郭沫若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三人的学术关联,从郭沫若与梁启超“史学新义”、“罗王之学”、胡适及新历史考证学等几方面,考察了郭沫若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关系。周书灿(苏州大学)考察了作为“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对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等“三堂”的学术贡献与不足所做出的评价,认为郭沫若在评价甲骨三堂学术贡献与地位问题上的得失,正是郭沫若为革命而学术的思想在学术实践中的具体体现。罗诗谦(苏州大学)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郭沫若史学研究的趋势与走向,认为当今的郭沫若研究呈现出重新回暖、回归理性,并更加重视横向比较的趋势。

在对特定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考察方面,张杰(中国国家博物馆)认为,大革命时期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密切相关的,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史学变革相辅相成,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思考怎样认识社会;陈伟扬(广西师范大学)在发言中回顾了五四时期有关社会主义论争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归纳了早期中国共

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以及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和分配问题的看法,认为共产党人最终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回应了当时的诸多讨论;郭士礼(成都理工大学)考察了学术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主导地位的强化过程,通过比较陈寅恪、郭沫若对《再生缘》的研究,指出不同学者在研究当中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高希中(历史理论研究所)细致梳理了新中国“前十七年史学”的发展脉络,认为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之中,存在打破学科壁垒、理性跨学科研究、民本思想、二元对立及斗争思维尽头之后的深思等观点,为当下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经验与深刻启示。

冷金乘(武汉大学)对马克思的历史阶段理论进行了溯源,认为马克思并没有“社会形态”的描述,也没有提出“五形态”说的严格表述,相较于黑格尔对辩证法的使用,马克思只是在历史阶段理论中使用了辩证法。刘耀辉(重庆师范大学)在发言中重点关注英国无产阶级思想家 E. P. 汤普森,认为他的研究既关注到民主化模式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也涉及道德经济学与妇女史研究的问题。梁道远(宁夏大学)梳理了中东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现状,认为中东史学史的研究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

三、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

本届研讨会对于传统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的关注跨度极大,自先秦至近现代不同时期的各种史学问题基本均有学者关注,关注点也极为丰富多样,表现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在对中国传统史学写作及相关概念、史学史发展的关注上,侯德仁(苏州大学)的发言从体例规范、内容取材、文字表述、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五个方面,探讨了《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提要的学术价值;宁腾飞(河南大学)认为,中国历史研究除关注经史关系外,子史关系也是重要一环,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延伸,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发展,也是近代尊史说的发扬,考察近代诸子学要回归当时的语境之中;谢贵安(武汉大学)对明清官史关于西器东传的记载与书写做了较全面的梳理,他指出,官史对西洋奇器的取舍受到了重道轻器观念的影响,它反映出官方意识形态依国家利益需要而对西洋物质文明迎受或拒斥的本质特点;章益国(上海财经大学)将“风”视作中国传统史学的一种独特认识论;他提出,传统学问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性在传统史学中同样存在,但今人若把“观风察势”的思维方式完全视为虚妄则带有现代科学主义的傲慢和偏见;朱露川(北京师范大学)选取《史记》以降的代表性史著,总结并阐发了中国古人关于历史撰述类例法的理论性探索;陶禹(中山大学)以《华阳国志》为例,说明中古早期地方史编撰中存在着一种“后发性困境”,即以常璩为代表的史家为了使地方史符合帝国正史的规范而对带有神话传说性质的史料进行了有意删改,并指出对早期地方史之“建构史”的考察有助于令历史解释获得一种“宽容”的多元性。周一平(扬州大学)则结合自身求学治学教学的相关经历,强调史学批评在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呼吁学界对中国史学批评的研究投入更多精力;郭锦泽(首都师范大学)从书写体例与作者意识方面入手,分析了《太史公自序》在汉唐间的流传与影响;张卓(首都师范大学)则通过对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考察,力图还原当时所谓的“宋人气象”;王榕烽(福建师范大学)深入回顾、考察了明代科举与孝道之间的互动及其影响,在进一步明确了科举职能的基础上,认为当时的科举与孝道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在对近现代学者的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考察方面,学者们主要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分享了自己的观点。董成龙(北京外国语大学)以民国战国策派学者林同济的博士学位论文入手,认为林的博士学位论文观点的新颖之处在于征引了日本京都学派的观点、提出应从民族边疆角度考虑问题、较早与拉铁摩尔等国外学者展开对话等;何昱杰(首都师范大学)的发言主要讨论章钦的《中国通史》,并以章钦为代表,观照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朱希祖为代表的北大史家群体,凸显他们在新史学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武黎嵩(南京大学)则以梁启超、柳诒徵两人关于文明史观的观点交锋进行比较研究,梳理具体到观点个案及梁、柳在日本的游学经历,详细论述了文明史观对中国前途的指导作用;陈勇(上海师范大学)的发言涉及钱穆治古史地理的理论与方法,通过个案分析,罗列了钱穆的治古史地理的成就,分析钱穆治古史地理的三大原则,并就此提出四点思考;吴航(淮北师范大学)的发言梳理了朱希祖搜集南明史料的情况,对南明史料的重视和对相关文献的考辨鉴别,介绍了朱希祖有意以现代科学方法写就一部南明史专著的情况;张凯(浙江大学)通过分析刘咸炘的学术语境和内在理路、以源流互质的方式考察了刘咸炘的史学观念,试图在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徐国利(上海财经大学)的发言主要从《中国史纲》出发,论述张荫麟在编撰新中国通史方面的成就。他认为,张荫麟持中西调和和文化观、主张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生命力和优越性,因此他致力于整合中西史学方法来建构新中国通史范式,使《中国史纲》成为一部彰显了人文主义精神、实现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的通史经典名作;刘克辉(河南大学)从历史的概念及范围、历史学的作用问题、历史观这三个方面论述了胡秋原《历史学概论》中的史学思想,认为胡秋原的史学思想是他对甲午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的思考,因而其一生的学术研究都是以对“中国往何处去”的探寻为起点和归宿。

在针对特定史家的个案考察之外,一些学者也关注到中国传统史学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吴原元(华东师范大学)对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域外汉学研究进行了评述与反思,认为该时期的域外汉学研究具有强烈的以服务现实需要为依归及强调价值主体性的特点,虽然泛政治化导致了对于域外汉学的过度批判,但其对价值主体性的强调无疑是值得肯定的;陈永霞(贵州大学)梳理了近三十年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理论研究,介绍了其学科建设的现状。她强调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对象应限于主位研究,而客位研究应归属于中国民族史学史学科;黄璐(福建师范大学)回顾了1980年以来国内对明至民国闽粤赣山区市镇的相关研究,认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华北等地的市镇,对山区市镇的研究相对薄弱。

四、史学理论核心观念

在本届研讨会上,学者们除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多有关关注之外,所讨论的另一个重点论题就是西方史学理论的相关核心观念。与会学者或通过聚焦特定史家开展个案研究,或关注到特定的史学核心概念进行深入分析。

吕和应(四川大学)在发言中指出梅尼克时代的历史写作与当今历史写作存在差别,将梅尼克放在其历史语境中进行解读。他认为,梅尼克对历史主义的定义主要强调个体性及其发展,并以此来进一步探讨梅尼克与历史主义危机、梅尼克的历史主义叙事特点,指出梅尼克在德国与西方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尉佩云(山西大学)从知识史的背景出发,通过分析历史意义、讨论历史主义与历史知识性质的发展、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教育的发展等问题,深入探讨了约恩·吕森对德罗伊

森史学的继承与革新;景德祥(世界历史研究所)从兰克的青年时期入手,通过考察兰克的书信及其他相关史料,指出兰克在青年时代曾经与德国自由与民族运动的领导人物关系密切,兰克本人曾一度对普鲁士的政治高压产生反感,他与普鲁士国家的合作关系,是在其史学研究得到普鲁士政府的认可与支持之后才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的;陈建(临沂大学)通过对杰克·古迪所进行的识字社会史研究的考察,指出古迪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人类智识技能创新的研究;王利红(北京联合大学)对维科的历史哲学进行了细致考察,指出从中途下降、回到起点和下降是维科的研究原则,这体现出他的浪漫主义特征。在维科看来,神话故事体现出诗性智慧,他将哲学与语文学相结合,开辟出历史研究的新方式;翟韬(首都师范大学)关注到白鲁恂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认为白鲁恂比亨廷顿更早提出强大政府论,以及第三世界如何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他的理论观点是现代化破坏了政治发展,这有别于阿尔蒙德更注重比较历史的方法,白鲁恂与亨廷顿一起颠覆了现代化政治发展理论;陈慧本(上海师范大学)关注到科泽勒克的概念史,指出科泽勒克的概念史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阐发思想的实践途径,科泽勒克的概念史与他的时间理论是互惠的,通过历史时间理论,科泽勒克对有关时间、历史现实等元问题做出回答;施华辉(杭州师范大学)的发言集中在对约翰·西利的史学观及其政治意涵的讨论上,认为西利希望通过历史学对民主展开政治教育,同时,西利从史学改革入手建立科学的政治教育,其史学实践是对民主和时代的回应;黄冬敏(湖南师范大学)介绍了伏尔泰人文主义思想的研究基础,思考了人在社会中的境遇,认为伏尔泰并未对其人文主义思想展开系统的阐释,而目前的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曾金华(邵阳学院)以马克斯·韦伯的历史研究为例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剖析,指出反欧洲中心论实际上是在尝试讨论如何认识不同文明的独立性问题。

除了上述以特定史家作为个案切入史学理论核心概念研究的学者之外,也有学者选择直接从概念入手展开研究。邓京力(首都师范大学)主要考察了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宏大叙事危机的情况下,西方史学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以及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向及其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易兰(湖南师范大学)追溯了传教士在希腊罗马史学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分析了罗马史学独立地位的确立过程,描绘了其求真与致用的史学形象,展现出中国学人在吸纳外来史学文化时所经历的心路历程;顾晓伟(中山大学)提出一种化解当代历史知识客观性问题的新思路,认为讨论历史能否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问题古已有之,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实际上是一种学科共识,应当尝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范丁梁(华东师范大学)关注到19世纪德意志历史学家对社会干预路径的转变,认为当时的德意志学者相信人文学科能对国家发展做出贡献,他们希望为德意志民族统一做出政治引领,而当德意志统一后,历史学家的目标则转向了塑造个人修养与人文意识;李学智(天津师范大学)基于对恩格斯合力论的考察,指出虽然学界将恩格斯提出的合力理解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一种动力,然而实际上恩格斯并没有说合力等于动力,传统理解可能脱离了恩格斯的历史语境;余伟(中山大学)在发言中讨论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历史证据,他认为,需要对普通的证据概念和作为历史学术语的证据概念进行区分,求真的历史学应当建立在明显性的基础之上;李根(长春师范大学)指出史学研究应当关注历史学存在的古物学属性,强调布洛赫、莫米利亚诺、金兹堡对历史学的古物学属性的思考都反映了历史学研究的叙事性材料的内容含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刘志来(湖北第二师范大学)的发言集中在对威廉·麦克尼尔生存圈理论的探析上,认为生存圈理论将对外扩张的几大动力概括为长距离贸易、技术交流与宗教传播带来的影响,其理论局限在于未能阐释人类所处的复杂关系网络,而且较少涉及对城市文明之间关系的讨论;卓立(西南政法大学)关注到经验证实本质的历史现象学建

构,强调有必要对经验证实中的知识确定性信念加以重新反思,并重申了实证史学的重要性;钱茂伟(宁波大学)首先梳理了公众史学的相关概念,分析了当下公众史学人人参与的难度,以及人人参与途径的多元化,指出可以通过技术解决公众史学未来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张骏(四川大学)以国家学说理论为例,分析了19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危机;刘山明(复旦大学)通过对近代犹太史学编纂的研究,指出犹太史学不应被排除在西方史学研究的传统之外;周厚琴(陕西师范大学)通过梳理当代俄罗斯史学的发展脉络,提出了其中蕴含的动乱学研究的新趋向;胡宇哲(首都师范大学)从史学理论的角度对博物馆学进行了反思,认为历史学与博物馆学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对博物馆展示的本质过程进行探讨时,引入史学理论可以使人们对其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五、西方史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

在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传统史学、西方史学等传统论题之外,本届研讨会还力图打破中西史学之间的时空壁垒,设立以“西方史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为论题的专场讨论。在该场讨论中,与会学者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针对西方史学研究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富有特色的“中国看法”。

徐毅(广西师范大学)以“大分流”国际学术讨论为出发点,梳理和总结了20年来在英语世界由这一国际学术讨论所引发的有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势和新进展;刘成(南京大学)指出,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在性质上与海外中国史研究有更多的相似性,而同国外学者的本国史研究与国内学者的中国史的研究有更多差异性。他认为,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不必与外国的本国史研究亦步亦趋,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应该从中国的现实关怀出发,在国别史研究中体现中国眼光,由此才能真正确立中国的外国史研究的地位,并为国外学者的本土史研究提供中国观点;张井梅(苏州大学)对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进行了再思考,将该现象置于整个欧洲历史与文化视域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深入探讨了欧洲文化与“中国热”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廉敏(历史理论研究所)就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进行了讨论,首先对有关“问题意识”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并从问题产生原因的角度出发,提出三条理解“问题意识”的可能路径;何宛昱(中国国家博物馆)从陈瀚笙的个案研究入手,考察了20世纪上半期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国研究,认为陈瀚笙将学术研究与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阐述了中国问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其研究方法、学术视野及关注的时代主题均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影响;魏涛(历史理论研究所)考察了欧美大西洋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趋势,希望国内历史学者能够在了解大西洋史的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突破以帝国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框架。

六、史学比较的可能性及其实践

“史学比较的可能性及其实践”是本届研讨会设立的另一个特别论题,与上一论题力图打破中西史学之间时空壁垒的目标相对应,该论题着力强调史学研究中的“比较视野”,尝试展现史学比较研究中的丰富多样性,扩展史学研究者的视野。

王忠孝(复旦大学)从马克斯·韦伯的“正当性”理论出发考察罗马帝国初期的元首制,认为罗马帝国初期君主制的关键性难题在于政权“正当性”的缺失,而以奥古斯都为代表的罗马君主在统治

过程中都在为自身的统治不断寻找“正当性”；张艳茹（历史理论研究所）主要考察了二战后日本的地域史研究。她指出，日本对历史资料的保存极为完好，但国内对日本这一部分资料及针对这些资料所进行的研究的利用还有所欠缺；伍斌（东北师范大学）关注到美国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国阐释及其限度，认为针对美国移民史的跨国阐释有助于拓展移民史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对其他地区的移民史研究也可以有所借鉴。不过，他同时强调，跨国史的研究决不能忽视民族国家的历史作用。白春晓（武汉大学）从修昔底德与拜占庭的历史书写出发，认为拜占庭史家对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古代史家的效仿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由此可以剖析拜占庭帝国的学术、教育和文化变迁，厘清拜占庭帝国早、中、晚不同时期的社会转型；李友东（天津师范大学）对20世纪西方学界有关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探讨，归纳了其大致趋势，并指出国内相关研究在未来发展上可能的努力方向。黄璐（复旦大学）通过比较海登·怀特与克罗齐的历史哲学，认为怀特的历史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克罗齐历史哲学的当代实践。

七、见与不见——女性主义史学之眼

在传统的发言、点评和讨论的分组讨论形式之外，以强调互动的圆桌会议的讨论形式展开针对特定史学前沿话题的交流，是本届研讨会的又一亮点。围绕“见与不见——女性主义史学之眼”这一论题，众多与会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姜进（华东师范大学）指出，面对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传统史学，女性主义史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其首要任务是将女性还给历史，寻找女性先祖的印痕，追溯她们活动、思想和情感的发展轨迹，重建女性历史的谱系。她介绍了多部北美中国学中的女性主义史学经典，强调北美中国女性主义学术是整个女性主义学术运动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女性主义的普遍关怀和理论假设出发向中国历史发问，以有鉴于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王燕（华东师范大学）考察了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劳动和劳动史，指出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去看劳动、以及以劳动为分析范畴的史学，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历史进程和历史中人的经历。现代劳动观的产生、发展、落地生根，潜移默化改变了中国家庭中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中国妇女一方面凭借劳动打破传统藩篱，获得了经济独立和重塑性别关系的机会；另一方面，逐渐等级化的劳动重新分配了妇女的劳力，将处于公共空间的劳动置于顶端，而家庭中的劳动有时作为公共化的对象，有时又作为亲属的义务变得越来越边缘化。苑莉莉（上海社会科学院）考察了法国女权主义和反女权主义在历史过程中的博弈，并介绍了法国女权主义研究的框架结构和研究方法。陈雁（复旦大学）认为，妇女运动和妇女史是紧密相关的，妇女运动需要扎实的妇女史研究成果的滋养，而妇女运动的推进又为妇女史培养了有政治理想、工作热情和学术能力的研究群体。妇女史是妇女研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八、全球史及现当代史学研究的兴盛与困境

“全球史及现当代史学研究的兴盛与困境”是本届研讨会圆桌讨论的另一个论题。围绕这一论题，与会学者围绕会议引言人提出的话题要点，展开了充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杨华（山东大学）探讨了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和影响。她认为，关于《怀柔远人》的讨论揭

开了国内大规模探讨后现代史学的序幕。后现代史学主要通过学术期刊笔谈栏目的集中讨论、西方后现代史学论著的引介和后现代史学理论专著的出版这三个方面进行传播。国内学者对后现代史学众说纷纭,主要关注后现代史学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对历史客观性的冲击、后现代史学的语言转向及文本化的历史这四个方面。后现代史学既有破坏性的一面,也有积极性的一面,所以应当理性地认识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冲击,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孟翊洁(东北师范大学)从后现代语境入手,考察了“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再现问题,认为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怀疑论者基于“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再现问题提出了采用“中间声音”进行历史书写的设想,这种尝试性的解决方案探索,对后现代语境下学界的研究指向具有启发性。

基于上述引言,与会学者针对后现代史学各抒己见。赵立行(复旦大学)认为,不能因为人类认识历史带有主观性,就否认历史本身的客观性,要警惕“历史纯主观化”的危险。姜进指出,后现代主义挑战了现代主义思维的根本性假设,国内在理解后现代概念的时候不能只是在表面上断章取义。目前国内学界理解后现代主要依靠翻译国外的作品,但翻译水平参差不齐。她呼吁翻译者要尽可能忠实于原文。她认为,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方法论的不同,但价值观仍旧是一脉相承的。现代主义坚持只有一个完全客观的绝对真理,而后现代对“真理只有一个”进行了质疑,后现代主义批判科学崇拜,主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真理是所有视角的综合,因此后现代主义主张存在多元真理和宽容接纳他人的观点。

随后,赵立行向与会学者提出一个问题:不同认识的主体会得出不同的真相,但真相是后天综合的产物,还是先验预设的产物?真实是否只存在于每个人自己的认识和书写当中?与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陈雁认为,真相有不同的层次和侧面,比如法律所判定的就是庭审的真相;姜进指出,后现代主义认为真理无论是否存在,都是无可企及的,只能接近真理;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和文学之间有共通之处,是指史料中有无穷无尽的事实,而史学家的任务是在找出事实的基础上去解释它,这就需要依靠逻辑和想象在事实之间建立联系,但在研究中不能基于想象成分而否定史学中的实证成分,因为文学和史学所使用的材料是不同的;张智(复旦大学)指出,利奥塔在反对启蒙时代提出的普世主义时指出,人是被语言、习俗困在其中的,人是以民族、语言和性别等形式存在的群体,但群体之间、民族之间难以沟通和相互理解。

总之,概观本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当代史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这一主题,既勇于直面已有问题,又积极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案和发展方向,为新时代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发展贡献了智慧。

(作者吴晓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阿慧,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邮编:200433)

(责任编辑:吴英)

(责任校对:张旭鹏)